

五四后文化运动新势力的兴起

洪峻峰

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对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是前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人们论及这个问题,都强调五四运动促使原来启蒙队伍的分化。胡适晚年也一再强调五四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政治干扰”,断言它导致了启蒙的中断。其实,五四运动虽然促使部分新文化人转向现实政治,但却推动了某些社会政治势力投入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化运动新势力的兴起,从而造成了“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正如周作人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五四运动后,文化界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①。本人文从五四启蒙角度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文人,这两股文化运动新势力的兴起作一探讨。

—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在“五四”后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是当时新文化界的一股新兴势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第一次护法又告失败。1918年6月下旬,孙中山回到上海,杜门养晦反思。他的结论是:革命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革命党人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的毒害,因而对于革命学说、革命宗旨和方略信仰不笃所致。据此,他把破除“知易行难”的传统思想观念作为当时的第一要事,于7月开始着手写作,阐述“行易知难”之理。

孙中山把思想革新视为首要任务,表明他已开始认同于五四启蒙思路。但他最初只

是试图以“孙文学说”武装革命党人,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党进行整顿改组。他在1918年8月以后的信函中一再表示“先理党务”、“先固内力”,认为这才是根本之策。1918年底,孙中山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已意识到,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担负重担;“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②然而,担负建设之责任的国民,其思想状况又如何呢?他说:“国中大多数之劳动界国民不知政治之关系,放弃主人之天职”^③。他认为,年来共和政治屡遭摧残,固然是由于武人专横,但国民的觉悟状况也是一种原因。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提出:“今日欲维持民国,须于地方上开通民智,振起民气”。^④因此,他把拟议中的心理建设由党内扩展到一般国民。1919年元月,他在致蔡元培等人的信中便称:文所著述,“意在溥及国民,广行传布”,“以启迪国人,俾灼知共和政治之真相为何,国民之所宜自力者为何”^⑤。孙中山看到了共和政治失败与民智未开的关系,提出了启迪国民的问题,表明他的思想已大致与五四启蒙思路相吻合。然而,如何启迪国民呢?在“五四”之前,他的想法只是将其学说著述成书,刻印刊行,广为传布,而未认识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意义,没有找到启迪国民的切实途径。

五四运动的爆发,对孙中山是一个重要

① 《知堂回忆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4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7页。

③④⑤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0、8页。

启示。他一方面看到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众的力量，因而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思想启蒙的力量，找到了启导国民思想的方法。1919年6月18日，他在一封信中便称：“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①1920年1月29日，他又致书海外国民党同志，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②这种认识使他找到以其学说唤起国民的下手之处。“五四”后，他在坚持著述的同时，指派他的追随者创办了《星期评论》、《觉悟》、《建设》等报刊，与五四启蒙者紧密配合，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

《觉悟》是《民国日报》的新设副刊。《民国日报》系国民党人创办，由叶楚傖主持。该报于1916年1月就已出版，但在“五四”前与新文化运动并不相干；“五四”后则改用白话文，并推出新型副刊，成为当时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最主要的报纸之一。《星期评论》是小型周报，由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主编，1919年6月8日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创刊。该报采用白话，形式上完全仿效《每周评论》，所以一出刊就被新文化人引为同道。《建设》月刊是孙中山亲自主持创办的大型理论刊物，1919年8月创刊，由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五人组成“建设社”负责编辑出版。1920年1月，孙中山向海外同志介绍说：“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③这话也表明了他们创办这些刊物的目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建设》月刊发行到一万三千多份，

《星期评论》则曾达十几万份，可见在当时影响之大。

国民党人投入新文化运动后，立即与《新青年》同人联系，与他们呼应配合，争取他们的承认和支持。当时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出京避难，而胡适则接办了《每周评论》，成了启蒙队伍中主持实际工作的一人。由于这一情况，加上胡适在5月上、中旬到上海迎接杜威时，与孙中山有过接触，因此，国民党人首先找上了他。《孙文学说》1919年5月下旬出版后，孙中山即命廖仲恺寄赠胡适，请他指正。廖仲恺向胡适表示：“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④胡适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写了《〈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一文，发表于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对此，廖仲恺又致书胡适说：中山先生读后，“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此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还望先生于书里不很完全的地方，指示指示，第二版付印的时候可以修正，请先生不要客气”^⑤。他们一再向胡适谦虚乞教，主要是希望借助新文化人的力量来扩大孙文学说的影响。

《星期评论》出版后，胡适首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予以褒扬。《星期评论》的三位主编则联名致函胡适表示感谢，并请其帮助寻觅代销处。此后，又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应约写了《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等文，又发表《乐观》一诗，以这首诗答谢该刊主编。1920年1月3日《星期评论》“新年号”，又刊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建设》月刊尚在筹备中，主持者就已多次写信约请胡适撰稿。当胡适答应写稿，廖

①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210、210页。

④⑤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65、66—67页。

仲恺急忙致函表示“实在了不得的高兴”。又说：“若是有了稿子，请先生赶紧寄来，否则也请先生有工夫的时候，回我几个字，说甚么时候可有稿子，我们立即就登预告。”^①后来，胡适写了《井田辨》一文，对胡汉民有关田井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廖仲恺则写了《答胡适论井田书》，转述胡汉民的答辩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建设》第二卷上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杜威之道德教育》等文，还多次连载胡适口译的杜威演讲录。胡适和其他新文化人的支持，扩大了国民党人的这些新办报刊在新文化界的影响，而这些新办报刊的加入，又壮大了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势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对于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基本思想和命题，如反传统、道德启蒙和文学革命等，大都不赞成。他之所以指派其追随者投入新文化运动，是因为他认为新文化运动这种启迪国人的方式，也必然是他们用“孙文学说”唤起国人的有效途径。就是说，国民党人最初的投入，他们与胡适等人的联络、配合，只是基于对新文化运动的“形式的认同”。

“五四”后，启蒙队伍发生了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派新文化人在对原先追求的民主政治的失望中，转而注目于俄国十月革命和研究社会主义，寻求新的政治目标，新文化运动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孙中山在杜门养晦、反省探索中，也把目光投向俄国，从十月革命中寻求启示、吸取力量，并对自己原先的政治目标进行重新审视，开始新的追求，从而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形成共识，达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的认同”。

国民党人参加新文化运动所创办的刊物，都致力于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社会主义，并与陈独秀、李大钊一派新文化人通力合作，形成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强大阵容。如《星期评论》社的主要成员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当时

就常与陈独秀等一起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乃至在1920年7~8月间一起筹建了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同年年底陈独秀离沪赴粤，也便把《新青年》交给了陈望道等人编辑。这些人当时与其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孙中山追随者一起，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股新兴势力。

二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文人，是当时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支重要势力。

研究系是袁世凯倒台后原进步党人重新组合成立的。研究系成立后即投靠段祺瑞，但起起落落的政治现实粉碎了研究系诸人的妄想，迫使他们退出政治舞台，重新考虑其活动场所。1918年5月，梁启超在致友人的信中称：“最欲郑重相告语者，此时宜遵养时晦，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②从这愤愤之语，不难揣度他当时的心情。不久又致书友人，表示：“顷复思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论。”^③这类似于《新青年》初期不议时政的约言。这一年的12月，梁启超等人出游欧洲的计划获得成功，临行前，梁启超与张君勱、徐振飞、张东荪、黄溯初等研究系伙伴会聚一起，于27日作了一夜长谈。后来梁启超写道：“是晚我们……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④此后，梁启超偕张君勱等人先出欧洲进行考察，而张东荪等人则留在国内创刊办报，为研究系文人开辟新的活动场所。

在转入思想文化界的初期，研究系文人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②③ 见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2、863页。

④ 《欧游心影录·欧行途中》，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9页。

并没有投入新文化运动。他们的一个重要动作,是复办被查封的《晨钟报》。该报改名《晨报》,于1918年12月1日在京恢复出版。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晨报》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直至1919年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对第7版副刊进行改组,才转变立场。李大钊曾任《晨钟报》的主编。而《晨报》副刊改组后,实际上便由他负责编辑。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研究系在京另一报纸《国民公报》也进行改革,转向新文化运动。而这时,张东荪主持下的上海《时事新报》,虽也推出了副刊《学灯》,但却仍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外。

研究系文人与新文化人自觉采取同一步调,结成一股力量,是在五四运动中,首先在对待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问题上。那时梁启超在巴黎搞外交游说,以原进步党人为骨干的国民外交协会便推他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诸事。至4月底,和会中我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外交努力已无望,梁启超便致电协会负责人林长民等人,告知外交失败的确切消息,并请其警告政府与国民,以不在和约上签字作最后抵制。林长民接电后即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称外交失败的消息已从梁启超的来电得到证实。该文刊于5月2日的《晨报》。5月3日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于7日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对付办法。蔡元培列名国民外交协会理事,他先将和会失败消息带给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北大学生于3日夜即召开大会,决定5月4日行动。在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研究系及其报刊都站在爱国师生一边,采取了反抗政府的立场。正因如此,从5月22日开始,京师警察厅便派员监视研究系报刊《晨报》和《国民公报》发稿,进行新闻检查。五四爱国运动使研究系分子与新文化人、与觉醒青年学生走到一起,而这成了他们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契机。

研究系文人转向新文化运动,首先表现在他们顺应了时代潮流,加入了宣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五四”前,张东荪曾发表《世界

共同之一问题》和《过激主义之防遏策》等文,说社会主义的过激潮流已成为一世界问题,应及早考虑防遏之策。“五四”后,研究系文人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于1919年9月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在该刊创刊号上,孙东荪发表《第三种文明》一文,便提出对“文化运动的方针”的如下意见:“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①所谓第三种文明,就是指社会主义文明。1919年12月,张东荪又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则已俨然以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自居。

与此同时,梁启超等在国内外的研究系文人也完成了一次思想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危机已暴露无遗。梁启超等人通过实地考察,目睹了这种种现象,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有一定省察。他在1919年10月至12月间整理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西方世界的衰败现象,表露了其失望之绪。这便促成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研究。而国内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也使他们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意义。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他一面致书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请求释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另一面又带领他的追随者,继续在他们主办的《晨报》、《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杂志等报刊上宣传新文化,研究社会主义。《晨报》副刊《自由论坛》、《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国民党人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了当时传播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的三大副刊。《晨报》还招聘瞿秋白等人为记者赴俄国考察,长期刊载他们寄自俄国的通讯,这在当时是一个壮举。

梁启超回国后,研究系文人便集中力量

^① 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

投入新文化运动。他们以一系列实际行动在客观上配合了胡适等人倡导的“再造文明”的文化活动。胡适在“五四”后重新阐释了新文化思潮的意义,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再造文明”,并以“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为根本途径。研究系文人也致力于其中。

研究系文人主要通过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来开展输入西方学理的工作。共学社成立于1920年4月,主要从事西方名著的译介。该社计翻译了数十种西方著作,其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讲学社成立于1920年9月,主要联系、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成立之初即续聘美国学者杜威(杜威原由北京大学聘请,已来华讲学一年多),接着又邀请英国学者罗素,后来又请了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其中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对五四时期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整理国故,梁启超着力尤多,且与胡适多有呼应配合。早在1918年他与胡适订交,就是缘于“墨辩”的整理。当时胡适正在作《墨辩新诂》,得知梁氏集有墨学材料甚多,便专程趋访,与他切磋,并借阅材料。待到梁启超出游欧洲返国时,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活动已开展得有声有色。1920年10月,梁启超写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自称写作的第一动因是:“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①他在致胡适的信中也称此书系遵嘱而作。^②胡适之所以希望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变迁,是因为他把清代乾嘉汉学视为自己从事整理国故的前驱。梁启超在书中也明确指出:“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③,并以胡适为清代考据学的殿军。此书对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寻根溯源,更重要的是推波助澜。1922年3月,梁启超应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社演讲,专门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

书;同年,他将自己多年来的墨学论著结集付梓,请胡适作序。梁、胡二人在各自的评论和序言中分别对对方作了肯定,但又提出批评、商榷,从而引发了学界关于墨学和老子年代的争论。1923年2月胡适拟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又对之提出批评,并另拟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从表面上看,梁启超似乎屡屡与胡适作对,而实质上,二人的争论大都是相互配合中的探讨和争鸣,目的都是为了整理国故。

由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文人常与其他新文化人展开争论,因而往往被人们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五四”后新文化队伍中也经常发生公开争论,并非发生争论就意味着新派旧派之分。以研究系文人为主角的争论主要有两次:一是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一是1923年关于人生观问题的“科玄论战”。在前一次论战中,他们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与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陈独秀等人相对立。然而,他们坚持的也正是启蒙者在“五四”前所追求、胡适派仍然在坚持的。在后一次论战中,他们强调意志自由,与强调科学理性的胡适派相对立。然而,自由与理性都是五四启蒙的根本精神。可见,这些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争论。而研究系文人成了“五四”后新文化界两次大论争的一方主角,正表明他们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洪峻峰,1958年生,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①③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② 见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3页。